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 马克思主义”文献选编

全国高校理工农医博士生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教学协作组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与马克思主义”
文献选编

全国高校理工农医博士生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教学协作组编

厦门大学出版社

[闽]新登字 09 号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

文献选编

周济 主编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仙游县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17.5 印张 453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ISBN 7—5615—0721—6/.45

定价:13.50 元

编者的话

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对理工农医博士生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要求在博士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原著和选读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有关代表著作的基础上认真组织教学。

为了将此课程的教学引向深入,1992年底在广州召开的全国高校第二届“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研讨会上,成立了全国高校关于此课的教学协作组,得到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司领导的赞同与支持。

为了帮助师生解决教学中查阅文献的困难,会上还成立了文献选编组,负责文献的编选工作,由厦门大学周济教授总负责,其中第一部分由南京农业大学陈文林教授负责,第二部分由华南理工大学彭纪南教授负责,第三部分由厦门大学周济教授负责,第四部分由同济大学范锡洪、第三军医大学肖进二教授负责,第五部分由清华大学魏宏森、刘元亮二教授负责,第六部分由华中理工大学苏子仪、杨长桂二教授负责。

本书汇集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重要论著,我国党政领导同志的有关讲话、报告,党和国家颁布的有关方针、政策、计划等文件,中外学者有代表性的重要论述,以及各主要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和政策等。由于这方面的文献颇多,限于篇幅,只能择其主要者编入此书。在教学中如有需要,请另选文献补充之。

本书是应1993年秋新博士生开课之急需而赶编出来的。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漏难免,请多指正!我们将通过大家的教学实践,在征求大家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充实,使之臻于完善。

在编选过程中,多承国家教委、许多高校研究生院(处、办)及任课教师们的关心、协助、支持与指导,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又蒙厦门大学出版社的鼎力相助,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编印任务,在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此外,厦门大学自然辩证法研究所的陈喜乐、贺威、欧阳锋、王明永和童荣兵等同志在校对和发行等方面做了不少具体工作,我们也表示感谢!

编 者

1993. 5. 1

文献选编组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序)

陈文林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
苏子仪	华中理工大学教授
周 济	厦门大学教授
范锡洪	同济大学教授
黄麟雏	西安交通大学教授
彭纪南	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魏宏森	清华大学教授

主 编： 周 济

目 录

编者的话

第一部分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1)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4)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马克思(8)
反杜林论(摘录)	恩格斯(12)
自然辩证法(摘录)	恩格斯(2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摘录) ..	恩格斯(52)
致符·博尔吉乌斯	恩格斯(61)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摘录)	列 宁(64)
辩证法的要素	列 宁(77)
谈谈辩证法问题	列 宁(79)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摘录)	列 宁(84)

第二部分

在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摘录)	毛泽东(86)
论十大关系(摘录)	毛泽东(88)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摘录)	毛泽东(89)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毛泽东(90)
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	毛泽东(92)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摘录)	周恩来(93)
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 ..	周恩来(100)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邓小平(104)
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邓小平(106)
从战略高度考虑教育问题	邓小平(119)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	邓小平(121)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146)
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摘录)	江泽民(151)

第三部分

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176)
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	(186)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208)
我国“星火”、“八六三”、“火炬”及“攀登”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229)
加强基础性研究,攀登科学技术高峰	宋 健(251)
关于火炬计划的几个问题(节录)	李绪鄂(258)

第四部分

当代著名科学家论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265)
当代著名科学家论现代科学技术和哲学	(306)
当代著名科学家论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	(331)
当代著名科学家论科学技术专家	(356)

[附录] 1. 科学的责任—1958年第三次帕格沃希代表会议宣言(摘录)

- Ⅰ. 首都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
- Ⅱ. 上海市科技工作者道德规范

第五部分

西方学者是如何评述新技术发展的·····	(379)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摘录)·····	(美)丹尼尔·贝尔(390)
第三次浪潮(摘录)·····	(美)阿尔温·托夫勒(417)
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摘录)	
·····	(美)约翰·奈斯比特(450)

第六部分

美国科学技术的政策与措施·····	(462)
原苏联科技发展的政策与计划·····	(467)
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与政策·····	(475)
原联邦德国的科学技术政策·····	(491)
英国的科技发展政策·····	(496)
法国科技发展的方针政策·····	(507)
巴西科技发展的战略与政策·····	(518)
印度的科技政策与计划·····	(524)

[附录] 1. 各国间科技参数和社会经济参数关系的比较

2. 日本和其它国家的科技政策大事年表

第一部分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

(一)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gegen ständige)活动。所以，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的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二)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三)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

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四）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的、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他没有注意到，在做完这一工作之后，主要的事情还没有做哪。因为，世俗的基础使自己和自身本身分离，并使自己转入云霄，成为一个独立王国，这一事实，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世俗基础本身首先应当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然后用排除这种矛盾的方法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庭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

（五）

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

（六）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不是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所以他不得不：

（1）撇开历史的进程，孤立地观察宗教感情，并假定出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类个体；

（2）所以，他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

（七）

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

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八)

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九)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十)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十一)

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写于 1845 年春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 16—19 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做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莱茵报》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莱茵报》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莱茵报》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

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

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①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②。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原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286和195—209页。——原编者注

的贫困》^③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1850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中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要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象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然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卡尔·马克思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1—85页）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1—198页。——原编者注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马克思

现在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 1859 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概述在这一卷的第一章中。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①。以货币形式为其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

① 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个，斐·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